

票证的见证

付洪珍

要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伟大功绩，那可是多了去了，说上几天几夜也说不完。

见证一：肉票

这一项就足以说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伟大功绩。三十多年前，吃点肉真难。如今吃肉不算回事。市场上卖肉的摊贩排成长龙，一个紧挨一个。鲜灵灵的牛羊猪肉，要哪给刺哪儿，非常方便。不禁使我想起三十多年前，买肉的经历。

1978年，刚进腊月，媳妇对我说：“咱家还有三斤肉票，你上班走时带上，早点儿把肉卖了吧。年根儿肉紧，买肉的人多，要不买不上。”我说：“甭着急，我上班的单位距供销社肉部很近，怎么也能买上肉。”

腊月二十了，她又催我。我就把三斤肉票带上了。肉食部是八点开门儿。七点半到肉食部一瞧，好家伙，买肉的队伍排上了。这跟我想的真不一样。因等上班没功夫排队，就回了单位。

第二天晨，特意早起，六点到了肉食部，又排上大队了。心想，不怨她说早点儿买。我今天还买不上，又回单位了。

第三天，天还很黑，五点我就来到肉食部一瞧，又来到人家后头了，没办法排队吧！买肉的人陆续还来。因为天冷，冻的手脚生疼。一个人说：“哎，二哥，我在你后头，你盯着点儿，别叫旁人加塞儿，我找点柴禾烤烤手脚去。”说完就到墙旮旯儿划拉几把乱柴点着就烤。又有几个人烤去了。他们围在一堆火的四周。边烤边议论。甲说：“我来两回了，也没买上肉。”乙道：“吃点肉真难啊！”丙：“……”还有的人干脆出言不逊了：“奶奶的，把猪卖给公家，给点儿肉票，楞买不上肉。”

“咣当”一声，肉食部的门开了。售货员出来说：“排单行，排单行。今天就发十五个号，十五人以后的就别等了。明天再说了。”他说完，排队的人乱了。大伙儿蜂拥而上，把售货员围个风雨不透，水泄不通。若干只手向他伸去。“给我一个。”“给我一个。”“给……”售货员不知给谁好了，他把号条往空中一扔说：“你们抢去得了。”号条从空中落下，大伙在地上滚的滚爬的爬，你抢我夺。一个五十岁开外的人被人压在底下，也没抢着号。从地上爬起来，用手拍打着身上的土，生气地说：“养猪的是孙子，吃肉的是爷爷，以后孙子不养了，爷爷你也甭吃了。”没抢着号的人，都悻悻而去。结果我也没买上肉。

我向来不爱求人，走走后门儿也不是不行。可是这样做总觉得心中不安。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也顾不了许多了。只好走后门儿了。当时长沟公社副主任郑有国，我们相处了一段时间。把几斤肉票给了他，他给买了三斤肉。又从生产队分了几斤，六口人过了一个年。

想起了这段经历，我不知别人想法如何，我是激动万分。什么是真理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经过实践检验，改革开放的路子是对的，行得通的，老百姓是非常欢迎的。

见证二：粮票

说了肉票，再说粮票。肉，几天不吃，甚至几个月不吃都能过得去。可是粮食，一天不吃都不行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，这段时间中，各种物资匮乏，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随着下降了。由于有些物资常常发生抢购现象。于是国家就实行了票证制度。其他票证先不说，就说粮票。给每人定量的粮票，有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分；男女人之分；大人孩子之分。定量不一，有多有少。当时我在商业局主管的单位上班。做会计工作。每月给我二十八斤定量。当时二十多岁，正是能吃的年龄。一天才合九两粮，副食又极缺，真吃不饱。白菜萝卜是常菜，每人只给半小碗儿。不够吃就加盐，吃盐多就喝水多。后来下肢浮肿了。不光是我一个人这样，有好几个人这样。经大夫诊断后，他说：“没别的原因，就是喝水太多而至。”于是请示领导批准，给浮肿人员每人买条鱼和二斤白糖，做为营养品。并叫卧床休息七天不上班，进行补养。

我们1962年，连白菜萝卜都少见。当时房山城东有个村叫田各庄，那里有个商业局主管的畜牧场。他们研制出一种所谓的“淀粉”。职工伙房的管理员，天天骑着车到那里带一桶淀粉回来，掺在棒子面里蒸窝头（淀粉，是用剥棒子的老皮，经过泡制而成），这种窝头，吃到嘴里越嚼越多，极不好吃。

此时期，国家号召机关干部和企事业单位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第一线。我响应了号召，于1962年6月，从房山县商业局辞职还乡了。

到家后，除了参加生产队劳动，起早贪黑，开垦荒坡，开一片种一片。因为节气已晚，只能种些晚秋作物，如萝卜、荞麦等。这个时期又给了一点自留地，一点点自留地，对农民来说真是宝贝，自己想种啥就种啥。这样，农民的生活稍有好转。在外头当工人的可受了大屈了。都到次年春天了，有的工人还拿着铁锹挖年前秋天刨白薯时丢的白薯呢。那白薯在地里埋了一冬，都成白粉子状了，他们就吃这东西。

这个时期，粮票千真万确是好东西。在我印象中，这种现象延续到七十年代末期。

1978年12月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，农村搞土地大包干儿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这样一来，粮食产量上去了。记不准从什么时候，粮票就销声匿迹了。从这时起，人们可以敞开肚子吃了。同时各种副食也逐渐多了起来。副

食一多，也吃不了那么多粮食了。所以，粮票也算是改革开放后的伟大功绩见证之一吧。

见证三：布票

1962年6月，从房山县商业局辞职回来，是阴历5月，正赶上麦秋。只在家歇了两天，就跟社员们一起参加割麦子了。割麦子是每人割两个垅儿。在前的人要打要子，把割掉的麦子放在要子上，后边的人也把割掉的麦子放在要子上。然后给捆上，这叫帮要子。刚下地时，抓耳挠腮的还能跟上。不到两个小时，我就招架不住了。大汗淋漓，腰也疼。哎呀！真是割麦日当午，汗滴麦下土。要知面好吃，嘴嘴皆辛苦哇！下午我就戴上了手套。有人问我：“天气这么热你戴手套干啥？”我说：“手磨泡了。”手磨泡的事儿，不知是谁告队长说了。次日一出工队长说：“洪珍，你别上地了，到场院干点儿零活儿吧。十多年没干割麦子的活儿了，冷不丁一干怎么行呢？”就这样劳动了一年多，各种活茬儿都适应了。

转眼到了1964年，小四清运动开始了。小四清运动没结束大四清就接上了。四清工作队由三四人增加到七八人。重新建立起以贫下中农为主的“农民协会”。在工作队的指导下，清理阶级队伍，清组织，清思想，清账目等问题，清来清去，生产队和大队的干部，程度不同的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。有人一提，不管真假，一时弄不清，先上楼挂起来（停止工作，进行反省叫上楼）。白天劳动，晚上开会，一个一个的检查交代。这一来，村中的一切事务没人管了。工作队又不能事事都直接插手。窘境中，不知是谁，把我辞职还乡两年的消息告诉了工作队。

一天晚上，工作队队长李芹（她是新华社的领导干部，女的）就找我谈话，叫我担任党支部代理书记，做了我好几个晚上的思想工作，但我就是不应声。反复强调还乡的目的是参加劳动。后来李芹对我严肃起来，她说：“你的组织纪律性哪去了？一个共产党员不服从分配，想想你的后果。”她对我讲这些，我又害怕了。心想，她要是给我个处分，那是一句话的事儿。得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于是我才承认下来，当了北甘池村党支部代理书记。

这年冬天，我和贫协会开会决定，要在村北打一个一字大井，建立扬水站。开工的第一天，空中飞舞着雪花儿，我带着群众在工地干活儿、工作队也和群众一样在工地劳动。歇着时，工作队的韩铁城同志教唱：“我们的传家宝：勤俭是我们的传家宝，社会主义建设离不了，离不了。好钢要使在刀刃上，千日打柴不能一日烧，不能一日烧。青年是我们的传家宝，社会主义建设离不了，离不了。”

他教唱歌下来，我又给宣读河南省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的革命事迹。还教唱那支歌儿：“焦裕禄啊，我们的好书记，你就像红灯一盏照耀大地，风吹不灭雨打不熄一片丹心，为党生为党死从不为自己……”

工作队队长李芹，瞧我穿着一身露着黑棉絮的破棉袄还挺乐观。她忽然问我：“洪珍，你就身上穿的那件破棉袄吗？”“是的。”我说。她又说：“怎不做一件呢？”我一乐说：“我也想做一件。说好说，可是一没布票二没钱，做不起哟！”

大约过了半个月，李芹通知我，到她的住处去一趟。我去了，她亲手给我二十尺布票和三十块钱说：“这是我们请示上级批准，给你补助的布票和钱，拿回家叫孩子妈给你做件棉袄吧。”当时，我的眼泪扑簌簌就流了下来。是一个孩子在妈妈面前哭泣的情景。党组织就是党员的妈妈，一个党员就是党组织的一个孩子，有哪一个做母亲的不爱抚自己的孩子呢。

用这布票和钱，于 1965 年，孩子妈给我做了一件新棉袄。连穿带不穿的，我存它十五年，到 1980 年，孩子妈没叫我知道，她给扔了。否则留到现在做个纪念多好。如今的市场，各种布花花绿绿，琳琅满目。所以我说布票也是改革开放的伟大功绩见证之一。

付洪珍：原房山县商业局干部